

三一之頌：臺灣大會審定之《聖詩》 版本考訂（1922-1942）*

盧啟明**

摘要

1912年，臺灣南、北教會聯合成立了「臺灣大會」，成為最高決策單位，其重要決議之一，就是將南、北使用的聖詩一致化。源此之故，乃於1922年5月推出了羅馬字《聖詩》，9月推出漢字《聖詩》。

臺灣大會時期的聖詩版本異常繁多，變動幅度甚大，顯示時人不斷增加新詩，修正舊詩，採取「實用性」的想法，而不是將某版本定於一尊的「標準化」模式。目前資料所見，首數有二個大類，語言文字載體則有羅馬字、漢字、琴譜（含試用版）三個系統。188/192首數有九個版本；348/342首數有八個版本。

研究發現，聖詩的編輯呈現「多源性」，兼含1900年《聖詩歌》、1914年《養心神詩》、1918年《孩童聖歌》和《基督徒詩歌》等內容。同時，聖詩又具「多元性」，以臺灣大會出版聖詩的年代1922-1942的20年間，多達17個版本，讓信徒依照需要和能力來選用。而本文也比較了過去只有在資料上略為提及，但實際上幾乎從未被討論的1941年和1942年手刻謄寫版本。

* 本文發表於「第三屆聲音的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0.9）。感謝黃智和、駱維道、江玉玲、余耀文、蕭真真之協助；李金幸、駱維道之評論，及審稿人的指正校訂。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主任

來稿日期：2021年1月15日；2021年5月4日通過刊登。

總之，過去的研究較重視曲目分析，強調「首數異同」和「詩詞內容」，做為聖詩的傳承依據，沒有注意到語言文字載體和版次，誤以為只有一個系統，且經常將羅馬字、漢字、琴譜（含試用）的版本，互植為單一來源的因果關係。事實上，透過版本的考訂將使得曲源分析更加細膩。這三個系統分立又合一，好似神學上的「三位一體」（Trinity），使長老教會呈現豐富又有張力、特殊的聖詩語言文化。

關鍵詞：長老教會、臺灣大會、聖詩、教會音樂

一、前言：聖詩對教會的意義

所謂聖詩（hymnbook）是一般教會禮拜儀式中，供會眾使用的詩歌本之通稱，此係禮拜儀式音樂（liturgical music）也是功能性質的音樂（functional music）。詩歌是基督教的重要元素，具有宗教典禮的深刻意義，人們在禮拜儀式中，透過吟唱頌揚，表達讚美、感恩、認罪及服事。詩歌能強化個人對信仰的領受，做為宗教的重要媒介，並能傳承經文與宣揚教義，凝聚信徒向心力。¹

以1872年來北臺灣的馬偕（G. L. Mackay）為例，常在布道、洗禮、拔牙、婚喪等各種場合合唱聖詩，並分組教導人們唱不同程度的歌曲，使得音樂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傳播。同時他使用廈門、福州的《養心神詩》，用羅馬拼音歌詞，教人識字，並有初步樂理的教導。甚至，他將音樂納入神學校的正式教學項目，使得北部教會音樂得以迅速發展，為日後教會學校的音樂教育奠基。²

顯然地，19世紀英國、加拿大長老教會來臺時，醫療宣教常搭配詩歌吟唱，藉此吸引群眾，強化「因醫入信」的信仰基礎。當時傳教的主要對象是愛好音樂的平埔族，因此以詩歌來布道，正符合其習慣，且詩歌本身帶有基本教義，吟唱即能潛移默化之。在教會禮拜與聖詩布道的關係上，詩歌本身就是基督教敬拜禮儀的一部分，因此聖詩的吟唱一直是教會禮拜儀式中重要的程序，它不僅可以帶領禮拜時的情感，也可用以凝聚信徒的向心力。

同時，教會十分重視信徒的宗教教育，簡短詩句蘊藏的意涵，能夠淺釋教義的特質，使聖經中艱深的義理能夠顯明出來。再者，教會所設的各級學校，都教導學生唱詩。甚至在盲人教育中，也印有點字版歌本，不僅如此，聖詩也

¹ 高瑞穗，〈變遷中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會眾詩歌〉（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² 郭乃惇，〈馬偕與聖樂〉，《新使者》62期（2001.2，臺北），頁36-39。

常被拿來當做臺語羅馬拼音教材，從教會和學校對聖詩的應用，可見它在布道和教育的重要性。³

長老教會禮拜以講道為中心，禮拜的特質偏向靜態，而音樂則十分豐富，能夠帶來淨化、治癒及抒發情感之功能。易言之，音樂能夠兼容理性與感性，既有「聖言」的信仰教導，又代表「聖禮」的宗教奧祕。⁴ 因此，對於信徒來說，聖詩必須有一定的藝術水準，不是一般空泛的靡靡之音，但又要是能琅琅上口。⁵ 更重要的，聖詩被視為寶貴的「靈糧」，能養育人的心靈，成為與基督同行的生命。⁶ 而聖詩合唱的優美和聲，帶有美善與合一的宗教意涵，經常能夠感動人心，透過音樂的方式表達難以言喻的崇敬。⁷

二、聖詩的研究史

臺灣最早的《聖詩歌》，係英國宣教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於1900年主編的122首詩詞。1988年江玉玲開始研究，前往歐美多國，找出1814-1914年間的廣東和廈門版聖詩21種版本，整理400餘首與《聖詩歌》逐一分析，並附上每首詩的各漢文版來源、標題、韻律與段落數的比較，最後將《聖詩歌》製成17項系統分類。《聖詩歌》可搭配172首旋律，但本身只有一首真正附有旋律，其餘121首都只有歌詞，而且是以臺南腔寫的羅馬拼音，這些歷史淵源，深刻影響之後的各版聖詩。⁸

³ 鍾珮文，〈晚清基督新教在臺聖詩佈道之研究：以英、加長老會為例（1865-1900）〉（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141-142。

⁴ 潘馨逸，〈臺灣長老教會禮拜中音樂角色之研究〉，《新世紀宗教研究》18卷4期（2020.6，新北），頁235-257。

⁵ 鄭敏熙，〈楊士養牧師與長老教會「聖詩」〉，收入陳冰榮主編，《傳教師獎慰會25週年紀念刊》（臺北：傳教師獎慰會，1984），頁256-258。

⁶ 阮昭明，〈以聖詩來靈修〉，《新使者》123期（2011.4，臺北），頁23-26。

⁷ 李仁豪，〈愛上聖詩〉，《臺灣教會公報》2762/2763期（2005.1/2，臺南），頁19。

⁸ 江玉玲，《聖詩歌：臺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淵源》（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2004），頁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的教會公用聖詩（*SĒNG SI*），發展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在完整出版且長期被使用的版本中，1922年5月的羅馬字版是南北共用的第一本教會公用聖詩；1926年版是第一本附琴譜的聖詩；而1937年版是日治時期集各版之大成且增訂（漢羅、琴譜）的聖詩；1964年版是戰後第一本臺語聖詩，使用長達45年；2009年版則是晚近的版本。

臺灣歷來對聖詩的研究，始於宣教師明有德（Hugh MacMillan），他從1929年起以臺語羅馬字在北部教會機關報《芥菜子》連載專文。他於1950年出版的《聖詩之由來》，則是透過牧師駱先春、莊丁昌及郭和烈協助編輯，集結報刊專欄，闡明35首聖詩的背景，幫助信徒吟誦。⁹ 十餘年後，他增補資料，專冊介紹聖詩作者，做為臺灣宣教百週年紀念叢書之一，¹⁰ 他認為「聖詩的介紹也就是祈禱的準備」，讓人知其所吟、口唱心和。到2000年代，明氏的著作成為《聖詩史源考》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但比較可惜的是《聖詩史源考》只有注意到1936年試用版聖詩，沒有注意到之前的重要版本例如1922、1923及1926年版。¹¹

駱維道的早期研究則是神學院畢業論文改寫，探討近代臺灣聖詩演進史。在「傳到臺灣之讚美歌」章節，略述本土音樂背景，初代教會音樂概況（1865-1930）、臺灣教會音樂之發展（1931-1940）及戰爭前後的音樂發展（1941-1947以降）。然因當時缺乏足夠的史料，所以僅注意到1926年的琴譜聖詩，沒有發現到1922年和1923年版的羅、漢字聖詩。¹²

1990年代前後的研究，則有郭乃惇的專書，第三章談「基督教音樂再傳臺灣（1859-1945）」，內容以北部居多，敘述馬偕、吳威廉（William Gauld）、德明利（Isabel Taylor）等人的貢獻。¹³ 駱維道的專著第三部「教會

⁹ 明有德（Hugh MacMillan），《聖詩之由來》（臺南：新樓光復印書館，1950），序。

¹⁰ 明有德（Hugh MacMillan），《聖詩作者介紹》（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2）。

¹¹ 卓忠敬總編輯，《聖詩史源考》（臺北：大門，2000）。

¹² 駱維道，〈基督教詩歌之起源與演進：兼述臺灣教會音樂史〉，《神學與教會》3卷3/4期（1964，臺南），頁133-147。

¹³ 郭乃惇，《臺灣基督教音樂史綱》（臺北：橄欖，1986），頁15-48。

音樂事工」，有一節談到「臺灣聖詩的回顧與展望」，認為《養心神詩》、《聖詩歌》為閩南聖詩時期的代表；1926年聖詩為民謠聖詩之萌芽，再以1936/1937年版聖詩，為本地創作初期的象徵。駱氏認為，音樂具有時代背景，能夠感動人心、增強信心，成為可貴的信仰實踐。¹⁴ 胡忠銘則從荷西時期的聖詩「史前史」介紹起，指出19世紀是聖詩的復甦期，並在日治時期開始發展，指出聖詩的確是啟迪民智、拉近民心的一個良好媒介，並簡要介紹1900、1926、1936、1946及1985年版的聖詩演進。¹⁵

2009年新聖詩出版後，吳仁瑟研究了1900-2009年的幾版聖詩，針對聖經「詩篇」使用情形作一敘述，指出甘為霖、李麻（Hugh Ritchie）、巴克禮（Thomas Barclay）、梅監務（Campbell N. Moody）等人，經常使用詩篇的內容來作詞，並點出1936/37年版本的聖詩，除了詩篇（337-342首）以外，其他各首都以「阿們」來作詩的結尾。然而，吳氏並未比較1922年和1923年的版本。¹⁶ 李金幸的學位論文討論處境化聖詩創作的發展，經由研究不同時期的詩詞和音樂內容，可以了解到聖詩詩詞創作與神學思想演變兩者間的互動，也可以看出聖詩的作曲方式演變，及其與處境化之關聯。該文並詳細比較1922/1926年版歌詞修改處，以及1936/1937年版標題和曲目差異，是細緻的力作。¹⁷

綜上所述，通論性著作較少深入探討1920年代以降臺灣大會編定的聖詩，有的拿到部分版本就稱「第一版」，或未解釋版本的闕漏。因此，本文希望採取地毯式的梳理，盡量找出日治時期1920-1940年代的各版，用羅馬字、漢字、琴譜三種語言文字「載體」來考訂，說明版本更替的原因，而不是像過去單用「首數」為準。

¹⁴ 駱維道，《教我頌讚》（臺南：人光，1992），頁185-204。

¹⁵ 胡忠銘，《聖詩的認識與應用》（臺南：人光，1995），頁87-108。

¹⁶ 吳仁瑟，〈Tùì聖詩音樂風格kap語言ê轉變探討PCT禮拜精神ê變遷：以臺語聖詩中ê詩篇為例〉（臺南：臺南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13），頁18-41。

¹⁷ 李金幸，〈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09年版《聖詩》探討臺灣處境化聖詩創作的發展〉（臺南：長榮大學神學系碩士論文，2020），頁159-190。

本文希望探討的問題有三：首先，羅馬字為何有1922年5月「壹」版和1926年8月「一」版？其次，漢字1930年9月二版為什麼追溯的是1922年9月一版，跳過1923年12月版？其三，最近發現的1941年和1942年的鋼版謄寫琴譜聖詩，成書的過程和特色為何。而這些問題若不拆開用三個系統來看，就無法瞭解。最後，則嘗試回應版本繁雜的問題，並給予詮釋。

三、1922-1933年的聖詩版本演進（188/192首）

羅馬字	1922.5 [壹]版 (188) 宋忠堅編輯 滿雄才發行 臺南：新樓書房	1926.8 一版 (192)	1929.10 二版 (19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南：新樓書房
漢字	1922.9 一版 (188)	1923.12 [□]版 (188) 劉忠堅編輯 偕叡廉發行 臺北：臺北神學校	1930.9 二版 (19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北：教士會書房
琴譜	1926.6 一版 (19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聖 詩編輯部 臺北：教士會書房 臺南：新樓書房	1930.6 二版 (192)	1933.9 三版 (19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北：教士會書房 臺南：新樓書房

（一）羅馬字系列

對臺灣教會歷史而言，第一本聖詩是1922年5月的羅馬字無譜聖詩。在教會報刊記載「白話字的詩冊已經出版在賣，每本三角銀，郵費在外。」¹⁸ 雖然只有短短一句話的報導，但卻不能抹滅其意義。

目前最早提出研究的是翁佩貞。她仔細考察教會報刊、會議記錄，從開會吟詩的首數等小細節，非常精準地推論出該版聖詩的存在，其假設分毫不差，可說是教會史料學和版本學的一個好範本，唯一值得商榷之處，就是翁氏根據教會報的價目表，推測後來新舊版聖詩同時出售的版本，無法直接證明那就是1922年版的羅馬字聖詩，也有可能是1922年或1923年漢字版。¹⁹ 此外，當2007年尋得1923年版的聖詩時，翁氏卻未堅持原先1922年首版的正確說法，轉而認為第一本臺灣大會審定的聖詩是1923年版，是稍嫌可惜之處。²⁰

誠如翁佩貞與江玉玲的研究指出，1918年臺灣大會先出版了一本《增補聖詩20首》，並搭配使用1914年版的《養心神詩》，之後臺灣大會繼續準備編輯，預計再「加添數首聖詩」。²¹ 翌年，聖詩部會委員宋忠堅牧師進一步確認「臺灣教會自當編輯一詩冊合臺灣之用。」眾人決議請梅監務牧師加入編輯團隊，於是陣容包括高金聲、林燕臣、劉忠堅（Duncan MacLeod）、偕叡廉（George W. Mackay）、陳清義共七人。²² 到1920年，雖然沒有討論到相關事項，但聖詩部會仍以原班底繼續編輯。到1921年，聖詩部會報告，新詩冊已經可以交給南北書房付印。²³ 又過了一年，1922年5月，羅馬字聖詩終於推出。

溫兆遠的研究則首度以扎實的史料證實了1922年版羅、漢聖詩的存在，

¹⁸ 無具名，〈雜事：新的詩冊〉，《臺灣教會報》447期（1922.6，臺南），頁3。

¹⁹ 翁佩貞，〈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5-1964）：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41-48、55。

²⁰ 翁佩貞，〈英加長老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論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使者》102期（2007.10，臺北），頁4-10。

²¹ 《臺灣大會議事錄》7回30、33條（1918.4，臺南），頁13-14。

²² 《臺灣大會議事錄》8回12-13條、受大會託者6條（1919.4，臺南），頁3、13。

²³ 《臺灣大會議事錄》受大會託6條（1920.4，臺南），頁13。

並整理出詳細的「早期本土臺語聖詩版本的變遷（1900-1930）」。²⁴ 溫氏指出，臺灣聯合版聖詩（*Union Hymn Book for All Formosa*）的說法首見於1905年的《臺南教士會議事錄》，其後歷經近20年努力的成果，即是1922年版羅馬字《聖詩》，編輯者宋忠堅（Duncan Ferguson），發行者滿雄才（W. E. Montgomery）現藏臺灣大學總圖書館的1922年版白話字《聖詩》原為霧峰林家頂厝藏書，捐贈登記時間為921地震發生隔年的2000年。而從一本《聖詩》也能管窺當年林獻堂捐資建堂、林攀龍擔任教會長老、楊水心參與一新義塾，並與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梅監務、劉忠堅、廉德烈（Andrew B. Nielson）等宣教師的交遊互動。²⁵

溫兆遠的另一篇論文則考訂1922年版羅馬字《聖詩》的編輯與溯源，指出六大特色。其一，該版回應長久以來南部教會殷切期盼，收錄93首同時見於《聖詩歌》和1914年版《養心神詩》的詩詞，又收錄9首是《聖詩歌》獨有，故合計採用《聖詩歌》的詩詞達102首。其二，詩詞進一步細分為：就近上帝（139-143）、耶穌（144-149）、屬耶穌（150-156）、學耶穌服事耶穌（157-160）、天堂（161-165），並大幅增加27首「囡仔的詩」。其三，兼容各種版本，增補詩詞達57首。收錄1900年《聖詩歌》9首、1918年版《孩童聖歌》4首、1918年版《添補養心神詩》5首、1918年版《基督徒詩歌》5首；此外還有新詩詞34首，包括梅監務牧師修改6首、出處待考28首，後面這34首都是新的詩詞。其四，改換「中國」等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或不符時空環境的詞語，並修改吟唱時不符臺語聲調變化規律，或因詞語深奧而不知所云的詩詞。其五，針對約25首舊有聖詩進行修訂（repairing）甚至改譯（remaking），重點在於

²⁴ 溫兆遠，〈承先啟後的本土臺語聖詩：1922年版《大會聖詩》的出土與解題（上、下）〉，《臺灣風物》67卷3/4期（2017.9/12，臺北），頁147-181、167-185。溫氏特別指出，在1927.3.15-19有一本「細本漢字聖詩」，是「西式」但所在地不明。此外，雖然溫文細膩詳實，仍是漏掉「1930.6的二版琴譜」，也未列入「1933.9的三版琴譜」，致使整個版本排序不完整。

²⁵ 溫兆遠，〈第一本臺灣聯合版聖詩發現記[1922版]〉，《新使者》162期（2017.10，臺北），頁59-60。

使韻腳一致。²⁶

1926年6月，教會報刊通知新的琴譜和白話字聖詩兩種即將出版，教會為了出清舊版庫存，於是將舊版的大本羅馬字和漢字聖詩降價，呼籲信徒購買，宣教師廉德烈說：

請大家可買去用，前印這些是較大本，也較大字，是較合老人之用途。裡面的首調也是和新印的相仿，新印的，則有加幾首的下篇，和裡面的字句少許改換而已。就這樣用不要緊，因為也仍有許多人在用養心神詩。²⁷

因此，單純以羅馬字刊印的聖詩在1926年8月出版，報載「小本夾布皮4.5角、夾紙皮3角」²⁸，到了1929年10月再版發行。

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字聖詩1922年5月的版本（188首），姑且稱為「壹版」；而1926年8月的版本（192首）也稱為「一版」，是因為首數已經不一樣，所以重新計算版次。

（二）漢字系列

關於1923年版的聖詩，2004年時知名書法家曹容（秋圃）家族已捐贈一本給臺灣大學圖書館。²⁹ 之後在2007年，由余耀文從古物商購得品相嚴重破損的另一本聖詩，之後漢字版聖詩開始吸引學界注意。³⁰

²⁶ 溫兆遠，〈1922年版《SÈNG SI》編輯始末及其聖詩溯源〉，《神學與教會》43卷1期（2018.1，臺南），頁171-200。

²⁷ 廉德烈，〈通知：聖詩〉，《臺灣教會報》495期（1926.6，臺南），頁2。

²⁸ 無具名，〈聖詩〉，《臺灣教會報》499期（1926.10，臺南），頁4。

²⁹ 家族曹真、曹恕、郭曹娟娟，藏臺大總圖五樓線裝書區，索書號(B)244.4 1604，條碼號2352353。

³⁰ 盧啟明，〈余耀文電話訪問〉，2020，未刊行。

翁佩貞是首先介紹這版聖詩的研究者，認為它修改之後就成了1926年琴譜版。³¹ 然而，此一說法不夠充分，因為版次、載體、形式都不同，吾人只能將之視為「前身」，不能單純只看詩歌的數目和內容。

江玉玲則針對其中第35首的「萬世盤〔磐〕代我破開」做了詩詞的分析，認為是最早收錄這首漢字版的聖詩，³²（按：其實還有1922年9月的漢字聖詩）此外，江氏也細心地從斷簡殘編中，推敲出1923年版的聖詩編輯者為劉忠堅（ダンガンマクロード，Duncan McLeod），發行者則是偕叡廉（ジヨオギウキリエンマカイ，George William Mackay），發行所為臺北神學校，並製作曲目分析，梳理與前後版本的差異。³³ 從文言文的序，可知聖詩編輯的用意：

夫聖詩之作也。原為禮拜堂敬拜上帝。俾吾儕及期高吟稱謝上帝之恩。以表敬事者之誠心實意耳。但前日舊本雖有（按：1930年改成雖有舊本）。於傳教誦讀之下。無如人僅識其字。終不能得其義。則其中有所包含意思。皆未足通曉。故仍本其義。而以白話土腔闡明其意思。再增補數十首。且稍酌改其字句。視前較為妥洽。庶幾此後按期敬拜者。吟諸口自可悟於心。聽諸耳亦能會其義。如保羅所謂吾將以神祈禱。亦必使人明吾意。將以神頌詩。亦必使人達吾意。所患者土腔白話。未免無字為多。由是於無字之中。姑用正字。借其字義以代。邊加小圈為別。讀者若遇圈字。就字讀字。若無圈者。將字解說白話。吟下音韻字無不叶。即其登堂禮拜。何患口吟而心不悟。耳聽而意不會哉。抑以見頌祝上帝之恩為有真矣。敘此以聞。

³¹ 翁佩貞，〈英加長老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論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使者》102期（2007.10，臺北），頁4-10。

³² 江玉玲，〈【Rock of Ages】與【萬世磐】：甘為霖譯詞與詩歌創作探討〉，《關渡音樂學刊》8期（2008.6，臺北），頁145-179。

³³ Yu-Ring Chiang, "Ein neu entdecktes Gesangsbuch aus Formosa (Taiwan) 1923: zur Zeit der japanischen Besetzung",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en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Hymnologie (IAH)*, 37(2009), pp. 51-72.

大意是說，聖詩的用處是在禮拜堂敬拜上帝，吟詩稱頌，以表信徒的誠心。但是，過去人們識字不多，難解文言文的意思，於是就推出新的版本，用白話文略改幾處，使吟者明白詞義，並且在臺語有音無字時，仍盡量透過借義的方式，用漢字呈現，旁邊加小圈。如此，就像心靈的祈求也要搭配悟性的禱文一樣，讓信徒可以口唱心和，頌揚上帝的恩惠。

關於內容方面，溫兆遠從「首數」、「題名」及「內文」入手，比較1922年羅馬字和漢字聖詩與1923年漢字聖詩，這三個版本的差異之處。然而，溫氏所言：「版本對照閱讀上的不便，是造成這兩版聖詩滯銷的原因，從而導致史料的隱沒。」³⁴ 此一觀點只能說明上述三個版本的內容問題，造成滯銷，但無法推論「漢字版」不受歡迎，因為1930年漢字又出第二版，顯然還是有市場的需求。教會報刊說：

漢文大字的聖詩，前因為印了有的不合用，導致甚久不流通，今這次又改正，字真明，又好看，真合較老年的人之使用，都按照現時在用的琴譜那款，這樣全臺所用的聖詩都一致相同，已經出版。³⁵

黃智和的文章也是討論了漢字1930年版的192首聖詩，版權頁寫的是「二版」，它的一版是漢字1922年的188首聖詩，增加4首的原因，很明顯是受到1926年琴譜聖詩的直接影響。不過黃文題目「第一本南北大會合作的聖詩」並不正確，因為沒有追溯到羅馬字1922年版的聖詩。

這一系列的版本，其歌詞採用遇圈讀字、無圈白話的表記法，吟唱聖詩時配合司琴的曲調，如前所述若遇圈字就字讀字，若無圈者，將字解說白話，吟唱至結尾沒有阿們。另外的好處就是，羅馬字音節長短不一，所以要對上拍子有實質上的困難，漢字就比較好對上拍子。聖詩開頭除了序文以外，分別依序有文言

³⁴ 溫兆遠，〈承先啟後的本土臺語聖詩：1922年版《大會聖詩》的出土與解題（下）〉，頁176。

³⁵ 無具名，〈聖詩〉，《臺灣教會報》546期（1930.9，臺南），頁4。

文的上帝十誡、新誡、主訓其徒祈禱文、早上祈禱式、晚上祈禱式、將食飯祈禱式及信經等，作為信徒日常靈修祈禱的參考，也達到教育信徒的目的。這是首次在詩歌本中有輔助信徒靈修的教材資料，³⁶ 例如〈主訓其徒祈禱文〉：

我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
 所需之糧。今日錫我。我免人負。求免我負。俾勿我試。
 拯我出惡。以國權榮。皆爾所有。爰及世世。心正所願。

綜上所述，「新詩冊部會」成員如梅監務、蘭大衛、偕叡廉、高金聲等人負責龐大繁瑣的編輯工作，為了教會事務竭盡心力。全書草稿在1921年幾乎都完成，但正式書名遲至1922年臺灣大會始確定為《聖詩》並開始發售，此外，同意由原「新詩冊部會」決定人選繼續準備詩調版。這項工作直至1926年才以琴譜的型態面世，正式書名為《聖詩琴譜》，收錄192首。³⁷ 最後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何1930年漢字二版聖詩（圖1左）是追溯1922年漢字一版，跳過1923年版？

這可能是因為1923年版被視為「單獨存在」，或者是版權有問題，因其版權頁（圖1中）就沒有提及1922年版，至於後續所有漢字版的聖詩也都是追溯1922年版，直接跳過1923年版。這兩點或許可當作直接和間接的證據。例如圖1右為1962年11版的漢字版，一版就是追溯到1922年9月。

³⁶ 黃智和，〈被遺忘的聖詩本：第一本南北大會合作的聖詩〉，《臺灣教會公報》3346期（2016.4，臺南），頁19。

³⁷ 溫兆遠，〈1922年版聖詩編輯始末及其聖詩溯源〉，頁17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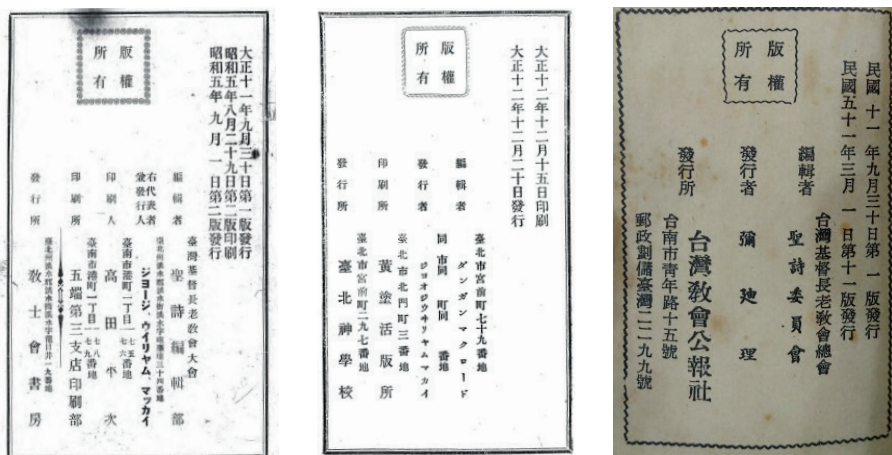


圖 1 三個版本的漢字版聖詩版權頁

資料來源：右圖駱維道提供。

(三) 琴譜系列

1926年6月琴譜聖詩出版，售價1.6圓，價格約是小本羅馬字聖詩的5倍。³⁸ 此1926版的《聖詩》出現了本地作品，是以採集平埔族曲調的民謠聖詩為主，也有不少五聲音階。此外，多增加了4首詩歌，第192首為日本國歌〈君が代〉。另外3首的歌詞首句分別是第189首〈容允細漢囡仔〉、第190首〈來就近我〉、第191首〈天頂的城上帝創造〉，³⁹ 分析後3首歌曲，與之前收錄的聖詩有些不一樣，並不太像是讓會眾齊唱的聖詩（hymn），而是類似詩班合唱的讚美歌（anthem），曲式較長且變化較多，而且也少了簡譜。

而版本之間還是有一些細微的差異。例如，在1923年版首次出現的55首詩歌中，第8首「至高的主做我的光」，在1926年版則以兩種不同旋律來唱。⁴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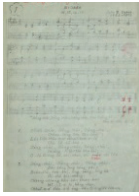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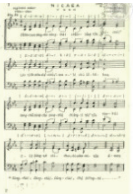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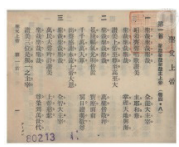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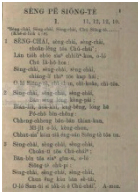
³⁸ 無具名，〈聖詩〉，《臺灣教會報》499期（1926.10，臺南），頁4。

³⁹ 按：191首的標題又作「天城金門」。

⁴⁰ 江玉玲，〈以1923年版《聖詩》與1926年版《Séng Si》首次出現曲目追溯2009年版臺語《聖詩》的詞曲來源〉，《臺灣音樂研究》9期（2009，臺北），頁65。

1926年版琴譜聖詩在各行五線譜上方，附記了Tonic Sol-fa的首調字母記譜法。此法普遍通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學校教育中，有別於1900年《Seng Si Koa》的盧梭數字簡譜。

四、1936-1942年的聖詩版本演進（348/342首）

琴譜	1936.12 一試 (34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北：明有德		1937.11 一版 (342)	
	1941.3 二試北 (34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北：福音社		1942.5 [二試南] (34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南：許水露	
漢字	1938.8 一版 (342)	1940.11 [二]版 (34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聖詩編輯部 臺北：福音社		
羅馬字	1938.8 一版 (342)	1941.8 二版 (34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會 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		

(一) 琴譜系列

1936/1937年版聖詩

1932年，南北聯合的臺灣大會創立20週年，在同年會議中，任命聖詩部會的相關人員，進行聖詩及主日學用詩歌的增補修訂工作。⁴¹ 到1934年，聖詩部會已召集委員，舉行第一次的籌備會議。事實上，此次聖詩的改版，依然是希望添加新的詩詞。相關人士認為「教會愈擴展，文明愈進步，大家就覺得聖詩不夠完整，不夠各種教會聚會的使用。」⁴²

關於1936年版本聖詩，翁佩貞詳細考察了聖詩編委的變化，還有試用本聖詩的拖延原因。⁴³ 這一版的印刷人是陳清忠，他增加了作詞者的人名年代，和聖經節來源，還印有琴譜，最特別的是在每首聖詩的後面，多加了「阿們」。⁴⁴ 因為是用手謄寫的試用本，錯誤很多，還曾刊登了7頁的「正誤表」。⁴⁵

1936年版的《聖詩》（以鋼板謄寫）含日本國歌〈君が代〉共348首，1937年改以鉛印，且減為342首，大致以19世紀後之福音詩歌為主，並加入明有德（Hugh MacMillan）、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吳瑪烈（Margaret Gauld）三位宣教師，及鄭溪泮、駱先春、蘇振輝、潘道榮、陳瓊琚五位臺灣人的作品，使得有本地色彩的作品達到21首詞，5首曲。⁴⁶ 相較於前一版本，總計增加3首詞曲、8首詞、1首曲。⁴⁷

⁴¹ 《臺灣大會議事錄》16回47條、受託14條（1932.3，臺南），頁13、17。

⁴² 無具名，〈公告II.新聖詩試用版〉《臺灣教會公報》617期（1936.8，臺南），頁3。

⁴³ 翁佩貞，〈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5-1964）：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頁59-70。

⁴⁴ 駱先春，〈新聖詩試用版發行近啦〉，《芥菜子》129期（1936.10，臺北），頁24-25。

⁴⁵ 駱先春，〈用心吟詩謳咗主〉，《芥菜子》133期（1937.2，臺北），頁26-28；134期（1937.3，臺北），頁25-28。

⁴⁶ 駱維道，〈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09年新《聖詩》之時代意義〉，收入輔仁大學音樂系所主編，《基督教與音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大出版社，2012），頁185。

⁴⁷ 李金幸，〈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09年版《聖詩》探討臺灣處境化聖詩創作的發展〉，頁201-202。

1936/1937年版以後，開始出現本地作曲者新創作的詩歌，作曲手法常見西洋曲式和聲為依據，並以大小調七聲音階的範疇，其中許多至今仍耳熟能詳，如臺灣本地作曲鄭溪泮的調名「羅山」（1936/1937皆22）搭配「聖罔耶穌從天降臨」；駱先春的調名「砲臺埔」（1936-179/1937-178）搭配「求主教示阮祈禱」；吳瑪烈的調名「雙連」（1936-208/1937-216）搭配「你有欠缺到失望」。⁴⁸

關於1937年版的聖詩，雖有一些資料認為是1936年就出版，但駱先春曾指出，他於1937年2月21日到三峽教會教唱新聖詩試用版，且後來的版次，也都有提到初版是1937年11月27日，⁴⁹ 這是沒有爭議的。

1937年出版的《聖詩》也有一首源自日本聖詩的歌曲〈KAMI NO AI〉神的愛。這是譯自1898年三谷種吉的歌詞，配上1893年美國牧師羅瑞（Robert Lowry）譜寫的旋律GOD'S LOVE來唱的詩歌。⁵⁰

關於1936/1937年版的差異有三。其一，1937版刪除1936版中的35、233、287、297重複的四首，及91、327、348（日本國歌）這三首，並新增一首256。其二，1937版將三段神學主題（三位一體、赦罪、靈交）重新編排至適當位置，並刪除1936版重複的標題「赦罪」及一次性標題「見證」。其三，17首同神學主題內的聖詩排列位置調動。⁵¹

1941/1942年版聖詩

1939年，聖詩部會將修改後的原稿送至日本星光印刷株式會社準備付印。不料在該年9月，印刷廠竟遭祝融，包括聖詩部會送去的原稿也付之一炬。⁵²

⁴⁸ 翁佩貞，〈英加長老教會聖詩在臺發展〉，《新使者》102期（2007.10，臺北），頁4-10。

⁴⁹ 陳建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詩溯源〉，《真理大學人文學報》8期（2009.10，臺北），頁31。

⁵⁰ 江玉玲，〈超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藩籬：臺灣聖詩精簡回顧〉，《藝術觀點》49期（2012.1，臺南），頁21。

⁵¹ 李金幸，〈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09年版《聖詩》探討臺灣處境化聖詩創作的發展〉，頁190。

⁵² 《臺灣大會議事錄》19回17條（1940.3，臺南），頁6。

之後，聖詩部會數次連絡印刷廠，商討預付款如何償還及後續付梓等問題，卻一直未獲回應。最後聖詩部會和南北二書房（公報社、福音社）共同商議兩個決定，首先，派劉子祥親自前往日本，了解實地情況，與印刷廠當面善處。其次，臺島尚存手寫的底稿，於是南北兩書房的印刷仍然繼續進行。議事錄記載從原稿燒毀到臺灣大會的半年間，北部是已經先起跑複印，北部版由「福音社」率先推出，負責人鄭進丁、書記黃六點都十分積極。報載出版的原因是：

久久在期待琴譜新聖詩，因為在東京被火燒，讓人不只失望。若是各教會有不只在等候，本〔福音社〕部會因為要服事教會的意思，有計畫用騰寫版，請名手製版來印一些，要應教會的要求……用80磅的洋紙，四六判版大，約400面左右，洋裝書封製本，定價3圓。⁵³

福音社找了北部的製版者楊木鎰，印刷人黃六點，版權頁寫1941年3月二版，追溯的是1936年12月一版，亦即「試用版」。在此，筆者認為，這只是拿1936年北部陳清忠所留下的手刻印本348首當底本而已，再請楊木鎰重刻成342首，如此也剛好避免掉要面對1937年版的版權問題。⁵⁴到1942年，臺灣大會聖詩部會追認福音社的版本，同時也承諾公報社可印刷有譜聖詩。⁵⁵

至於南部，製版者是謝福根，印刷所是臺南市開南堂騰寫藝術部，版權頁只有寫1942年5月。體裁是「80磅的洋紙，四六判，約400面，洋裝」，特價也相當便宜，精裝布皮只要2.3圓，平裝紙皮則是2.1圓，⁵⁶比北部版便宜。

要讓較多人得到較大的利益，所以有特別設法翻譯詩譜〔按：簡譜〕來

⁵³ 鄭進丁、黃六點，〈新聖詩出版啟事A.琴譜新聖詩〉，《北部教會》177期（1940.10，臺北），頁24。

⁵⁴ 此書由施惠安將父親施錫圭所用的聖詩於2020年6月29日捐贈給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臺灣神學院亦有一本，上有偕媽蓮的署名。

⁵⁵ 《臺灣大會議事錄》20回8條7款（1942.3，臺南），頁7-8。

⁵⁶ 此書典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索書號0739 34。

添附於琴譜的上面，就是琴譜兼詩譜新聖詩。謄寫的人是專門的技術者，印書的人也是技術者本身。這樣這本謄寫版的琴譜新聖詩允當真美術性，明又美，能夠滿足大家的期待。……⁵⁷

綜上所述，這兩版的聖詩是北、南各自用謄寫版複印，首數都是342，編輯者都是掛「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聖詩編輯部」，但仍有相異之處，除了版權頁透露的訊息外，在「各首頭列的目錄」排序有些不同，例如北部版有筆誤，169誤植199、175誤植174等；還有因為拼字關係而放在不同地方的例如296、289、168、130、196等。手寫刻鋼版的方式，自然魯魚亥豕不少。而南部版因為有簡譜，所以附上的經節會比較短。

（二）漢字與羅馬字系列

由於琴譜聖詩推出以後，漸漸成為主流，所以其他兩個系列在此合併簡述之。1938年8月，陸續出了342首的漢字和羅馬字二種聖詩。1940年11月，臺灣大會聖詩編輯部為了教會的需要，特別是年長者，推出漢字二版的聖詩，稱為「大字漢文」，以四號鉛字印刷，體裁和羅馬字系列一樣，定價紙皮5角，布皮8角。⁵⁸這也是臺北的福音社第一次出版1936/1937版新聖詩，報載還有許多教會在用舊版（1926）的聖詩，以等待新版的推出，特別北部常置委員會尤其希望屬下教會能趕快全面改換新版。⁵⁹最後的羅馬字聖詩則於1941年8月推出。不過還是要重申，聖詩的版次計算頗為特殊，不是用一般習慣的「首數」為依據，而是以語言文字「載體」為準，此一模式到了1960年代，仍然如此。

⁵⁷ 許水露，〈啟事_琴譜新聖詩欲出版〉，《臺灣教會公報》674期（1941.5，臺南），頁16。

⁵⁸ 臺灣教會公報社，〈II.大字漢文新聖詩發賣〉，《臺灣教會公報》667期（1940.10，臺南），頁3-4。

⁵⁹ 鄭進丁、黃六點，〈新聖詩出版啟事B.漢字版新聖詩〉，《北部教會》177期（1940.10，臺北），頁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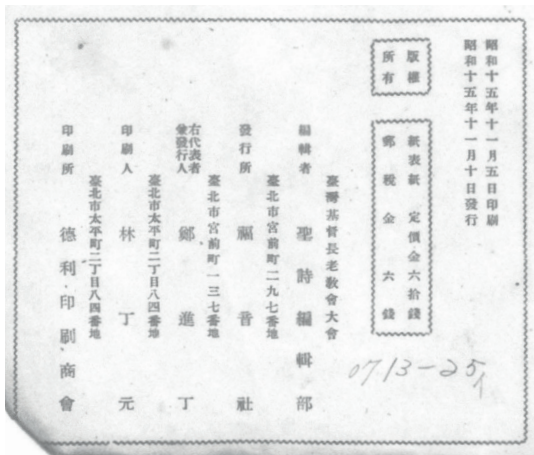


圖 2 1940年11月福音社出版1936/1937年版新聖詩版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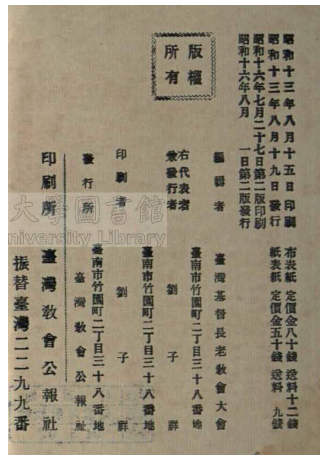


圖 3 1941年8月公報社出版羅馬字聖詩版權頁

五、結論

自19世紀末，基督教傳入臺灣已超過150年的歷史，當年來臺的宣教師們藉著音樂將教義與詩歌、以及西洋音樂的基礎概念一併帶入，讓臺灣的文化與音樂加豐富。基督教會的詩歌本收錄了西洋音樂史幾百年來的精華，加上音樂家們將藝術的才華和教義的詮釋，藉著詞曲合璧，一直滋養著會眾的信心。⁶⁰

基督教對臺灣鄉土文化中的語言、文字與鄉土音樂的保存與傳承頗具貢獻。尤其在音樂教育方面，舉凡樂理傳授、人才培育及社會教育上，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⁶¹ 長年以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音樂創作非常具有在地特色，例如駱先春編輯阿美族聖詩，使教會音樂能在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中得以延續、普及，又參與聖詩的編輯，創作詩詞。為教會音樂增加許多元素；陳泗治則創作宗教音樂，致力音樂教學，鼓勵教會重視宗教藝術。⁶²

⁶⁰ 陳建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詩溯源〉，頁21。

⁶¹ 盧維姪，〈基督教對臺灣音樂教育的影響及其在臺灣鄉土教材研究的重要性〉（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1994）。

⁶² 蔡巧莉，〈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音樂之創作（1936年至1996年）〉（臺北：東吳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1912年，臺灣南、北部基督長老教會，在母會英國、加拿大宣教師的支持下，聯合成立了「臺灣大會」，成為最高決策單位。終日治時期，臺灣大會所作的重要決議之一，就是將南、北使用的聖詩一致化。源此之故，乃於1922年5、9月推出了首版羅馬字、漢字《聖詩》，取名相對於《聖書》。

吾人從聖詩的案例可知，臺灣大會的聖詩部會雖然有功能，但是規範力並不強，雖然有得到臺灣大會追認，但是北部曾有三次自行發行聖詩，分別在1923年12月、1940年11月、1941年3月，顯示北部教會人士本身另有想法，不全然相應南部教會人士。換言之，在臺灣大會的「合一」架構底下，還是有許多細微的相異之處，南北並沒有完全一致，且似乎北部對漢字版接受度較高。

臺灣大會時期的聖詩版本異常繁多，變動幅度甚大，顯示時人希望不斷增加新詩，修正舊詩，採取「實用性」的想法，而不是將某版本定於一尊的「標準化」模式。目前資料所見，首數有二個大類，語言文字載體則有羅馬字、漢字、琴譜（含試用版）三個系統。188/192首數有9個版本；348/342首數有8個版本。

研究發現，聖詩的編輯呈現「多源性」，兼含1900年版《聖詩歌》、1914年版《養心神詩》、1918年版《孩童聖歌》和《基督徒詩歌》等內容。同時，聖詩又具「多元性」，以臺灣大會出版聖詩的年代1922-1942的20年間，共多達17個版本，讓信徒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經濟、識字、音樂能力來選用。而本文也比較了過去只有在資料上略為提及，但實際上幾乎從未被討論的1941年和1942年手刻謄寫版本。

總之，過去的研究較重視曲目分析，強調「首數異同」和「詩詞內容」，做為聖詩的傳承依據，沒有注意到語言文字載體和版次，誤以為只有一個系統，且經常將羅馬字、漢字、琴譜（含試用）的版本，互植為單一來源的因果關係。事實上，雖然琴譜聖詩漸漸成為主流，但是透過版本的考訂將使得曲源分析更加細膩。這三個系統分立又合一，好似神學上的「三位一體」（Trinity），使長老教會呈現豐富又有張力、特殊的聖詩語言文化。

表 1 整體版面編排與格式的變化⁶³

	首數	調名	作曲者	作詞者	首行	韻律	分類	聖經節	五線譜	簡譜
琴譜1936	V	V	V	V		V	V	V	V	
琴譜1937	V	V	V	V		V	V	V	V	V
琴譜1941	V	V	V	V		V	V	V	V	
琴譜1942	V	V	V	V		V	V	V	V	V
漢字1938	--	--	--	--	--	--	--	--	--	--
漢字1940	V	V					V			
羅馬字1938	--	--	--	--	--	--	--	--	--	--
羅馬字1941	V					V	V	V		

首數 1 作詞者 調名 分類
Resinold Heber 1788-1826 NICAEA 韻律 作曲家
Johanna Dymkes 1823-1876 簡譜
五線譜

SĒNG-CHAI SĒNG-CHAI SĒNG-CHAI CHĀN- IĒNG TĀA CHŪ- CHAI
LĀN TĪCH CHĒA SĪA' CHĪU- KOA O- LÓ CHŪ IĀ- HĒ- HOA
SĒNG-CHAI SĒNG-CHAI SĒNG-CHAI CHIĀNG- LĪ THĪ' TĒA KĀP- HĀI
O- LÓ SĪĀNG- TĒ CHĪ- CHUN, CHĪ-KĀN CHĪ- TĒA A- MEN

"SĒNG-CHAI, SĒNG-CHAI, SĒNG-CHAI, CHŪ SĪĀNG-tĒ,"

2 聖經節

圖 4 1942年版琴譜

⁶³ 增補自翁佩貞，〈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5-1964）：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頁89-94。

引用文獻

1. 《臺灣大會議事錄》16回47條、受託14條，1932.3，臺南，頁13、17。
2. 《臺灣大會議事錄》19回17條，1940.3，臺南，頁6。
3. 《臺灣大會議事錄》20回8條7款，1942.3，臺南，頁7-8。
4. 《臺灣大會議事錄》7回30、33條，1918.4，臺南，頁13-14。
5. 《臺灣大會議事錄》8回12-13條、受大會託者6條，1919.4，臺南，頁3、13。
6. 《臺灣大會議事錄》受大會託6條，1920.4，臺南，頁13。
7. 江玉玲，〈【Rock of Ages】與【萬世磐】：甘為霖譯詞與詩歌創作探討〉，《關渡音樂學刊》8期，2008.6，臺北，頁145-179。
8. 江玉玲，〈以1923年版《聖詩》與1926年版《Séng Si》首次出現曲目追溯2009年版臺語《聖詩》的詞曲來源〉，《臺灣音樂研究》9期，2009，臺北，頁57-76。
9. 江玉玲，〈超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藩籬：臺灣聖詩精簡回顧〉，《藝術觀點》49期，2012.1，臺南，頁21。
10. 江玉玲，《聖詩歌：臺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淵源》。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2004。
11. 吳仁瑟，〈Tùì聖詩音樂風格kap語言ê轉變探討PCT禮拜精神ê變遷：以臺語聖詩中ê詩篇為例〉。臺南：臺南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13。
12. 李仁豪，〈愛上聖詩〉，《臺灣教會公報》2762/2763期，2005.1/2，臺南，頁19。
13. 李金幸，〈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09年版《聖詩》探討臺灣處境化聖詩創作的發展〉。臺南：長榮大學神學系碩士論文，2020。
14. 阮昭明，〈以聖詩來靈修〉，《新使者》123期，2011.4，臺北，頁23-26。
15. 卓忠敬總編輯，《聖詩史源考》。臺北：大門，2000。
16. 明有德（Hugh MacMillan），《聖詩之由來》。臺南：新樓光復印書館，1950。
17. 明有德（Hugh MacMillan），《聖詩作者介紹》。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2。
18. 胡忠銘，《聖詩的認識與應用》。臺南：人光，1995。
19. 翁佩貞，〈英加長老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論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使者》102期，2007.10，臺北，頁4-11。
20. 翁佩貞，〈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5-1964）：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21. 高瑞穗，〈變遷中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會眾詩歌〉。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22. 許水露，〈啟事_琴譜新聖詩欲出版〉，《臺灣教會公報》674期，1941.5，臺南，頁16。
23. 郭乃惇，〈馬偕與聖樂〉，《新使者》62期，2001.2，臺北，頁36-39。
24. 郭乃惇，《臺灣基督教音樂史綱》。臺北：橄欖，1986。
25. 陳建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詩溯源〉，《真理大學人文學報》8期，2009.10，臺北，頁21-71。
26. 溫兆遠，〈1922年版《SÈNG SI》編輯始末及其聖詩溯源〉，《神學與教會》43卷1期，2018.1，臺南，頁171-200。
27. 溫兆遠，〈承先啟後的本土臺語聖詩：1922年版《大會聖詩》的出土與解題（上）〉，《臺灣風物》67卷3期，2017.9，臺北，頁147-181。
28. 溫兆遠，〈承先啟後的本土臺語聖詩：1922年版《大會聖詩》的出土與解題（下）〉，《臺灣風物》67卷4期，2017.12，臺北，頁167-185。
29. 溫兆遠，〈第一本臺灣聯合版聖詩發現記[1922版]〉，《新使者》162期，2017.10，臺北，頁59-60。
30. 無具名，〈公告II.新聖詩試用版〉，《臺灣教會公報》617期，1936.8，臺南，頁3。
31. 無具名，〈聖詩〉，《臺灣教會報》499期，1926.10，臺南，頁4。
32. 無具名，〈聖詩〉，《臺灣教會報》546期，1930.9，臺南，頁4。
33. 無具名，〈雜事：新的詩冊〉，《臺灣教會報》447期，1922.6，臺南，頁3。
34. 黃智和，〈被遺忘的聖詩本：第一本南北大會合作的聖詩〉，《臺灣教會公報》3346期，2016.4，臺南，頁19。
35. 廉德烈，〈通知：聖詩〉，《臺灣教會報》495期，1926.6，臺南，頁2。
36. 臺灣教會公報社，〈II.大字漢文新聖詩發賣〉，《臺灣教會公報》667期，1940.10，臺南，頁3-4。
37. 潘馨逸，〈臺灣長老教會禮拜中音樂角色之研究〉，《新世紀宗教研究》18卷4期，2020.6，新北，頁235-257。
38. 蔡巧莉，〈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音樂之創作（1936年至1996年）〉。臺北：東吳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39. 鄭敏熙，〈楊士養牧師與長老教會「聖詩」〉，收入陳冰榮主編，《傳教師獎慰會25週年紀念刊》。臺北：傳教師獎慰會，1984，頁256-258。
40. 鄭進丁、黃六點，〈新聖詩出版啟事A.琴譜新聖詩〉，《北部教會》177期，1940.10，臺北，頁24。
41. 盧啟明，〈余耀文電話訪問〉，2020，未刊行。
42. 盧維姪，〈基督教對臺灣音樂教育的影響及其在臺灣鄉土教材研究的重要性〉。臺北：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1994。
43. 駱先春，〈用心吟詩謳主〉，《芥菜子》133期，1937.2，臺北，頁26-28。
 44. 駱先春，〈用心吟詩謳主〉，《芥菜子》134期，1937.3，臺北，頁25-28。
 45. 駱先春，〈新聖詩試用版發行近啦〉，《芥菜子》129期，1936.10，臺北，頁24-25。
 46. 駱維道，〈基督教詩歌之起源與演進：兼述臺灣教會音樂史〉，《神學與教會》3卷3/4期，1964，臺南，頁77-161。
 47. 駱維道，〈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09年新《聖詩》之時代意義〉，收入輔仁大學音樂系所主編，《基督宗教與音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大出版社，2012，頁185。
 48. 駱維道，《教我頌讚》。臺南：人光，1992。
 49. 鍾珮文，〈晚清基督新教在臺聖詩佈道之研究：以英、加長老會為例（1865-1900）〉。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50. Yu-Ring Chiang, "Ein neu entdecktes Gesangsbuch aus Formosa (Taiwan) 1923: zur Zeit der japanischen Besatzung",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en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Hymnologie (IAH)*, 37(2009), pp. 51-72.

Trinity Hymnal: A study of the Versions of the Hymnal Reviewed by the Formosa Synod (1922-1942)

Chi-ming Lu*

Abstract

In 1912, the South and North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established the Formosa Synod,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body in the church. One of its significant resolutions was to unify the hymns us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Thus, the Formosa Synod published *Sèng-si* (the Hymnal) i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Pèh-ōe-jī) and *Sèng-si* in Han characters in May and September 1922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ormosa Synod, the versions of the Hymnal were varied and numerous, which indicates that people kept adding and revising hymns for practicality. They did not pursue certain hymnal versions as standardizing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ata, the Hymnal has two major categories: the 188/192 hymns including nine versions and the 348/342 hymns including eight versions, and has three language systems: Taiwanese Romanization, Han characters, and piano scores (including tria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ymnal is multiple sources; it contained *Sèng-si-koa* (the Taiwanese Romanization Hymnal, 1900), *Ióng-sim-sîn-si* (Amoy dialect

* Director of Archiv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Received: Jan. 15, 2021; Accepted: May. 4, 2021.

Hymnal, 1914), *Hâi-tông Sèng-koa* (Children's Hymnal, 1918), and *Ki-tok-tô Si-koa* (Christian Hymnal, 1918). Moreover, the Hymnal is various. From 1922-1942, there were up to 17 versions for people to choose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and abilities. This research also compared the 1941 handwritten edition with the 1942 handwritten edition, which was barely discussed before.

In conclusion, earlier researchers focused on analyzing repertoires, and they considered the difference and content of the hymns as the basic point for passing on the Hymnal. They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language systems and versions of the Hymnal, so they regarded the versions of Taiwanese Romanization, Han characters, and piano scores (including trial) as the same system. However, to analyze various hymnal versions is to clarify the sources of hymns. The three language systems are integrated and enrich the Hymnal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it looks just like the Trinity.

Keyword: Presbyterian Church, Formosa Synod, Hymnal, church music